

中国迈向世界大国之路

叶自成

内容提要: 中国具有成为世界大国所必需的人口、领土、经济实力等综合国力的基本条件,也具有成为世界大国的历史资源,还具有经济快速增长的有利的现实条件,中国成为世界大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家体现。但中国能不能成为世界大国,还要着重解决好以下三方面的问题,即坚持优先发展经济的总体战略,坚持走中国特色的民主道路和政治发展战略,慎重处理中美关系。中华民族能否实现伟大的复兴,最主要的挑战不在外,而在内。

关键词: 中国 世界大国

作者简介: 叶自成,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邮政编码:100871)

中国是世界上一个奇特的国家,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小国。准确地说,中国既不是一般的大国,也不是一般的小国,而是一个正在成长中的世界大国。中国具有成为世界大国的基本条件,但能不能真正成为世界大国,取决于中国如何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

一、中国成为世界大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家体现

1. 中国具有成为世界大国必需的人口、领土、经济实力等综合国力的基本条件

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领土,在世界领土大国中排名第三,具有成为世界大国的客观条件;中国有13亿人口,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占世界总人口的1/5,具有成为世界大国的人口条件;2002年中国GDP为10200亿美元,列世界第六位。中国具有较强的政治和军事实力。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是世界上五个核大国之一;中国继美国和俄罗斯之后,已经具备载人航天的条件,是世界上第三个拥有发射宇宙飞船能力的国家。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2002年至2003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的国际竞争力从2001年排名39位,上升到2002年的第29位。

但中国在综合国力的一些基本因素方面,还有较大的缺陷,主要体现在:(1)未能完全实现国家的统一,尤其是台湾问题对中国发挥国际影响力牵制较大;(2)中国国民人口基数过大,2001年国民人均GDP才899美元,仅占世界排名的第141位;(3)中国科技创新能力较低,总体上处于模仿西方国家先进技术的水平上,在高科技方面与发达国家有较大的差距;(4)在发挥国际影响力方面,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正在提高,但未达到与中国综合国力相当的水平,中国在世界经济总量中只占4%,比1900年前中国晚清时所占的6%比例还低。在许多重大的国际事务方面,中国的影响力相对于其他大国还是较小的。

从中科院发布的《2003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对中国综合国力进行的评价看,2000年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综合国力排序为第7位。各项指标的排名如下:在经济力的测算中,中国居第3位,前两位分别是

美国和日本；中国军事力排名第4位，前三位分别是美、日、英三国。此外，中国外交能力、生态力、政府调控能力分列第5位、6位、13位，社会发展程度及科技力均列第11位。^① 中国有优势的是，中国的国内经济实力、政府管理能力与发达国家共同处在世界前列，在科技竞争力方面具有与新兴工业化国家相同的较高水平，在国民素质竞争力、企业管理竞争力、国际化方面居于中等地位，而在金融体系竞争力、基础设施方面水平较差。^② 因此，中国具有成长为世界大国的基本条件。

2. 中国曾经长期是历史上的世界大国，具有成为世界大国的历史资源

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很长时期曾经是世界大国。一些西方人士指出，“在中国漫长的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内，它都属于世界上最富最强的国家之列”，中国在历史上确保了它的超级大国的地位^③；“中华帝国确实是集一切极致之大成者。她曾拥有地球上任何强权所需的最广阔的土地面积，最浩繁的人口数，最具有生产力的经济体，最具威力的军队及最先进的技术。……可能除了罗马帝国的极盛之外，主要中国王朝在人口及地理的统辖地都将世界其他地区所有其同期的帝国给比了下去”。^④

甚至与西方文明中最伟大的文明、古代世界最强大的世界大国罗马帝国相比，秦汉王朝时的中国也在许多方面超过了它。极盛时期的罗马帝国曾统治了约300万—40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而汉朝版图约有至少500万—600万；罗马帝国统治的全盛时期人口达到5000多万，汉朝人口约有6000多万；罗马帝国的军队约35万常备军和30万海外军团，汉朝时的军队有百万之众。^⑤ 罗马帝国从苏格兰的安东尼努斯至罗马，再从罗马到耶路撒冷的交通系统总长度约为5984公里，而秦时期修建的道路总长度约为6800公里。汉都城长安有35平方公里，人口有百万之众；而罗马城只有14平方公里。罗马帝国是奴隶制，而中国早已进入封建制。

亨廷顿认为“唐宋明朝时期的中国，8—12世纪的伊斯兰世界、8—12世纪的拜占庭，在财富、领土、军事力量以及艺术、文化和科学成就上远远超过了欧洲”，8世纪中国发明了印刷术，11世纪发明了活版印刷，但直到15世纪这一技术才传到欧洲。造纸术公元2世纪就出现于中国，7世纪传到日本，8世纪向西传播到中亚，10世纪到北非，12世纪到西班牙，14世纪才到达欧洲。^⑥ 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也曾指出，明朝曾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近代以前时期的各种文明中，没有哪一种比中国的文明更先进，更优越。”到了近代，中国虽然综合国力在下降，而西方国家的综合国力在上升，但即使如此，清朝强盛时的中国仍然是当时世界的大国之一，甚至是最大的贸易国家。1750年时，英国的工业生产只占世界工业产量中的1.9%，而此时的中国生产世界产品中的32%；1800年时，英国产量占世界的4.3%，中国占33%。一直到1860年时，英国占19.9%多，中国占19.7%，英国才第一次超过中国，此时的英国消费的能源是美国和德国的5倍，是法国的6倍，是俄罗斯的155倍。当时的英国人口占世界的2%，却拥有世界工业制造能力的45%，占世界商业的1/5，工业贸易的2/5。与此同时，英国的交通、邮电、运输等基础设施也建立起来了，1880年时，英国占23%，中国只占12.5%，1900年时，英国占18%，中国只占6%，英国把中国远远甩在了后面。^⑦

① 《中国可持续发展力排世界第7位》，《北京晨报》2003年2月28日。

② 赵彦云：《中国的竞争力在哪里》，《环球时报》2002年6月17日。

③ 理查德·伯恩斯坦、罗斯·芒罗：《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44—45页。

④ 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3—456页。毛思迪：《中国新霸权》（李威仪译），台北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5页、43—44页。

⑤ 郭长刚：《古罗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146页。人口数和面积数为本书作者根据有关资料估算。

⑥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

⑦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17—20、176页。

中国能在两千多年中多次成为强大的国家，自然有她的长处和优势，也为今天中国的成长提供了某些可以利用的文化历史资源。正如一些外国观察者指出的，“中国将最终以三种影响的结合为基础确定自己的国际角色：（1）中国漫长而富有活力的历史；（2）中国国内经济重点；（3）中国的政治挑战和安全忧虑。近4000年来，中国一直是亚洲的重要国家，并且很长时间内也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之一。今天，中国领导人相信，他们的国家在经历了短暂的历史间隔后，正作为一个世界大国重返它合理的位置。”^①

3.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的最有利的现实条件

在中国具有的成为世界大国的各种条件中，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其中最有利现实条件，也是中国成长为世界大国的最强有力的动力。

1989年至2001年，中国的GDP从16909亿元上升到95933亿元，年均增长率为9.3%，大大超过世界平均增长3.2%，发达国家2.7%，发展中国家5.2%的数字，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人均GDP按外汇汇率计算从1978年190美元，上升到1999年的780美元，2000年的840美元，2001年的899美元；年均增长8.2%，在世界209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从194位上升为141位。

2002年的国民经济持续较快增长，按外汇汇率计算，2002年中国GDP为10200亿美元，列世界第六位，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增加到41122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49%，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②全年进出口总额达6208亿美元。更重要的是，中国已经步入经济增长的快车道，已经具有了一种继续发展的“势”。

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是否能成为世界大国的最重要的经济发展指标，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发展及预测表明，中国在21世纪20—30年代将成为经济总量占世界前2—3名的大国，基本上具备了发展成为一个世界大国的经济实力。中国2020年有望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实体，经济总量将达到35万亿元人民币，按目前的汇率将超过4万亿美元，大体相当于现在日本的水平，位列世界第三；人均GDP将从900美元增加到3000美元。中国实现这个目标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中国具有四大优势：

（1）中国巨大的劳动力数量，质量也不低，价格相对低廉；

（2）中国的13亿人口有巨大的市场潜力，而目前这个潜力还未完全发挥；这就是被许多国家认为是十大世界新兴市场之首，相当于新兴市场容量的40%，按GDP计算是世界上第二大市场，占有世界市场的10%。这是中国最大的发展优势，是中国继续繁荣和保持长期发展的根本所在。^③

（3）中国有相对完善发达的工业体系，产业体系比较齐备；中国可利用信息化的技术条件，实现跨越式发展。^④

（4）中国政府的管理能力和控制能力较强，能保持较好的政治稳定的局面，从而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创造较好的政治环境。

所以，在中国国内不出现重大的政治动乱和重大经济决策失误的情况下，中国到2050年间基本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成为中等发达国家是有保障的。中国虽然到那时在许多方面还赶不上美国，算不上世界超级大国，但那时的中国的生存力、发展力和国际影响力将大大提高，成为名符其实的世界大国。

4. 中国成为世界大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家体现

中国成为一个世界大国，甚至在一些有远见的外国领导人看来，这也是理所当然的。美国罗斯福总统

①（美）吉姆·赫尔姆斯、詹姆斯·普里斯特主编：《外交与威慑：美国对华战略》（张林宏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8页。

②《国富民强，成就辉煌》，《环球时报》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整理出的数字，2002年11月11日。

③胡鞍钢：《中国战略构想》，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④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并不遥远的目标》，《人民日报》2002年11月25日。许宪春：《中国GDP：新世纪的步子能迈多大？》，《信报》2002年11月15日。

虽然在雅尔塔会议上背着中国与苏联达成了关于损害中国利益的协定，但罗斯福也是西方尤其是美国历史上少有的几位对中国的国际地位给予高度重视的有远见的领导人之一。他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就领土而言，中国是亚洲最大的国家，这个古老的大国注定要成为远东的强国，为人类的文明与发展做出贡献。罗斯福时期美国的对华战略之一就是承认中国的世界大国地位。当然罗斯福也认为，由于中国落后，因此中国要成为大国，至少需要三代人的教育和训练。^①

国内学者也有人认为，“取得世界强国地位对于 21 世纪的中国来说非常重要。它不仅是百年来中国许多志士仁人所希冀、所追求的一大目标，其实现关系到拥有 10 多亿人口的中华民族的自尊和自信，而且大大有助于减少中国遭受当今超级大国压抑甚至欺侮的可能性，大大有助于减轻所有可能对中国心怀叵测的国家的实在或潜在威胁，也大大有助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获得其他国家的合作和支持，从而能更有效地维护和追求中国应有的国际利益。”^② 因此，中国应当“逐渐加强走向世界大国的自觉意识”。^③

邓小平所倡导的现代化的最后目标，就是要“比较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只是比较接近，要完全同美国、西欧、日本水平一样，恐怕办不到”，要用几十年时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使我们的生产能力和总产值达到美国的水平，使中国可以接近发达国家水平。^④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人正式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战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战略，既是毛泽东和邓小平大战略的延续，又是在中国向世界大国迈进的历史进程中一个关键性的拓展。

江泽民在 2001 年的七一讲话中指出，“从 19 世纪中叶到 20 世纪中叶的一百年间，中国人民的一切奋斗，都是为了实现祖国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彻底结束民族屈辱的历史。这个历史伟业，我们已经完成了。从 20 世纪中叶到 21 世纪中叶的一百年间，中国人民的一切奋斗，则是为了实现祖国的富强、人民的富裕和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历史的伟业，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已经奋斗了 50 年，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再经过 50 年的奋斗，也必将胜利完成”。2002 年 11 月的十六大报告，从头到尾贯彻始终的中心词也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此开头，以此结束，先后九次使用了这一概念，指出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党的庄严使命”。^⑤ 而所谓“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国成长为世界大国，二者是一体不可分的；中国没有成为世界大国，充其量只是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复兴，而不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只有成为世界大国，才能说真正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国能不能成为世界大国，能不能把成为世界大国的潜力和条件变成现实的动力，涉及到人才、科技、文化、教育、环境保护等发展方面的问题，但其中最关键的还是在于中国如何走自己的世界大国的成长道路，如何选择自己的经济、政治和外交战略。它要回答三个最重要的问题：

(1) 在总体战略方面，中国当然要全面发展经济军事科技能力，但在一定时期内，中国是继续坚持经济优先发展还是把安全优先放在第一位？

(2) 在政治发展战略方面，是走西方的民主发展模式还是走中国特色的民主道路？

(3) 在对外关系方面，中美之间的矛盾是必然发展为激烈的冲突，还是有可能得到缓和，在较长时期内大体维护两国关系的基本稳定？

这三个问题都是事关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的时间、速度、方式和成败的关键问题。

① 赵志辉：《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中国观》，《美国研究》2002 年 2 期。

② 时殷弘、宋德星：《21 世纪前期中国国际态度、外交哲学和根本战略思考》，《战略与管理》2001 年第 1 期。

③ 王逸舟：《面向 21 世纪的中国外交：三种需求的寻求及其平衡》，《战略与管理》1999 年第 6 期。

④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57、89、120 页；《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第 323 页。

⑤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6—57 页。

二、经济优先是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的基本保障

1. 安全优先论的观点

中国要成为世界大国，应该首先关注中国的安全利益，国家安全比经济利益更重要。这种观点认为，国家利益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但最为重要的是战略即国家安全利益。军事安全与经济实力难以相互替代。在综合国力中，最主要的是军事力量。^① 还有些学者认为，中国优先发展经济的战略本来没有错，但问题在于美国和西方国家不给中国这样的时间。中国必须及时修正经济发展优先的战略，在没有时间全面提高综合国力的情况下，优先发展军事工业和军事技术，为此，中国从现在起就应优先迅速地加大与航天航空技术相结合的海军和空军建设。可以说，没有现代化的海军，中国肯定就没有伟大的未来，没有海权，中国就绝对成不了世界性的大国。还有的人主张以发展军事来刺激经济的发展，主张军备和军工先行，认为这可以为科技创新提供动力，“在生产过剩的条件下加强国防建设，不仅成本较低，而且还可以起到扩大需求、增加就业的作用”等。中国安全面临现实威胁，下一个被肢解的可能是中国。根据美国对付前苏联及前南斯拉夫联邦的经验，一旦条件成熟，以某种形式有限地肢解中国将是美国及其盟国不会放弃的选择。在安排好欧洲地缘政治版图之后，美国及其盟国就可能如法炮制，把目标指向崛起的中国，使中国在（有限的）分裂中彻底失去世界级大国的机会”。因此，优先发展军事以增强国家安全成为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的唯一理性的选择。“今天中国民主政治的推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海外经济，以及保护这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海上军事力量的存在水平”。^②

美国对伊拉克发动的战争将再一次加剧这种观点的发展。美国打完伊拉克，下一个会是伊朗、朝鲜……最后就会轮到中国，因此，中国必须优先发展军事力量。

2. 中国只能通过优先发展经济提高综合国力成为世界大国

军事优先从世界大国成长的历史来看，的确有一定的规律性。几乎所有的大国都是通过提高本国的军事力量和扩张性的战争成为世界大国的。二战后的德国和日本试图通过和平发展贸易的道路成为世界大国，但迄今为止没有成功。

但军事力量的提高，是建立在以经济实力为主要支撑的综合国力的基础上的。俄罗斯和苏联的兴衰史就表明，尽管优先发展军事力量的确有助于在短时间内成为世界大国，但这种世界大国的地位是不牢固的。在最盛时期，苏联的国防军事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占到了70—80%。苏联把30%的国民经济积累用于军事工业。苏联因军工优先而兴盛一时，但军工太盛也是苏联走向衰亡的重要因素。

美国今天的强大，也并不是军工优先的结果。相反，美国在发展海军之前，已经拥有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经济，成为世界上头号经济大国，美国能够发展海军也是建立在强大的经济实力基础上。1880年美国的经济就仅次于英国，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但军队人数却只有4万人，比俄国的90万、英国的25万、奥匈帝国的27万，法国的54万、德国的43万的规模小得多，是当时西方列强中军事实力最弱的一个。1900年时，美国占世界产量的23.6%，超过英国所占的18.5%的比重。在100年时间里，美国几乎从一个一无所有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上头号经济大国，工业产量增长30倍，平均每年增长30%。但美国成为世界大国却是在此之后。美国的军费开支2002年达3000多亿美元，但由于美国经济实力雄厚，它在美国的GDP总量中只不过占3%左右。美国的霸权不只是建立在军事上，主要是其强大的综合国力支撑的。

因此，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中国“不能从‘落后就要挨打’这一可贵的历史教训中引申出强大等于

① 阎学通：《国家安全比经济利益更重要》，《环球时报》2003年2月14日。

② 张文木：《科索沃战争与中国新世纪安全战略》，《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3期。

安全、越强越大越安全的结论。国力强大只是一般情况下国家安全的一个必要的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在没有大规模外敌入侵的情况下，很难想象中国应当为了寻求高度安全甚至绝对安全而严重分散资源投向，从而损害中国的发展速度和富强前景，与之相应，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强调国防建设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用一定程度的、可以容忍的相对不安全来交换更长远的更重要的富强机会，这是大战略的全局观念的恰当体现，是明智的”^①。还有的学者认为，“轻视外交迷信军事的思潮再次抬头，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新兴的世界大国来说，这是应当予以关注的”^②，“美国人不能剥夺中国发展的权利，中国的军国主义者却有可能断送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机遇”。“把中国的发展机遇和‘伟大的未来’系于优先发展军事，更是万分危险的”。^③ 这的确是对冷战和冷战后国际社会发展的一个深刻的总结。

实践表明，邓小平的经济发展压倒一切，经济建设是一切工作的中心，一百年不动摇的思想是极有远见和充满睿智的。世界历史也表明，没有军事力量的经济大国，做不了世界大国；但没有经济做保障的世界大国，其地位是不能持久的；当然，军事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也可以是不矛盾的，不对抗的，可以相互促进的。但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的有限资源范围内，一个国家不可能奉行面面俱到的战略，只能突出一点，带动全局。

因此，中国不能走也没有条件走军事优先的道路，中国只能走经济优先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提高军事力量的路。中国的综合国力的增强，首先是以经济发展、经济优先作为其基础的。正如邓小平曾经指出的那样，中国必须首先尽可能地减少军费来加强国家建设，然后在国民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改善武器装备，加速国防现代化。这就明确地提出了经济优先的战略方针。这一方针应当得到坚持和发展。在一个时期内，经济和军事不可能同时优先发展，只能把有限的资源优先放在某一方面。而对中国而言，中国应当首先发展成为世界性经济大国。当然，与此同时，中国要适当兼顾军事力量的发展，使中国的国防力量得到相应的成比例的发展。

三、中国式的民主发展战略将增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感召力

1. 政治制度对世界大国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因素

过去，一个封建的国家、奴隶制的国家甚至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群体，只要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就可以征服其他国家而成为强国。但这种时代已经过去了。一个国家成为世界大国必须拥有强大的经济、军事、科技等硬实力，但同时，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外交制度以及国家制度也越来越构成世界大国的软实力的重要内容。苏联丧失其世界大国的地位，虽然它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但是它的软实力水平低下，大大影响了它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苏联的失败不仅仅是综合国力的失败，甚至主要不是力的失败，而主要是制度的失败。一个自己的国民都很不满意的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很难对其他国家产生心理和道德上的说服力，让其他国家尊重和模仿。中国必须避免苏联的道路，在大力发展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科技实力时，也必须大力进行制度创新，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和创新。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中国政治上的改革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的国内政治稳定的局面也是吸引外资的重要因素。但中国政治制度中也存在许多问题，这些问题损坏了中国的国际形象，成为中国发挥国际影响力方面的负面因素，制约了中国综合国力的总体水平的提高。有一种观点甚至认为，从软权力方

① 时殷弘、宋德星：《21世纪前期中国国际态度、外交哲学和根本战略思考》。

② 喻希来：《新兴世界大国的成长之旅：光荣与梦想》，《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6期。

③ 王思睿：《时代特征与中国的机遇》，《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6期。

面看，中国的影响力是大大下降了，甚至下降到了 20 世纪的最低点。^① 中国国内政治制度中诸如官员腐败、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严重问题，大大有损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道德、形象和制度感召力。

中国如何在保持国内政治稳定的局势下，推动中国的政治制度变革向前进，如何解决国内严重的官员腐败等问题将成为未来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关系到中国是否能成为世界大国的重要问题。

2. 中国只能实行有中国特色的东方式的社会主义民主

在中国，始终存在着中国应当西化、按照西方的民主自由制度来进行中国的政治改革的思潮。从 20 世纪 30 年代全盘西化与中国化的论争，到 80 年代初的“民主之春”的西化思潮再到今天，要求中国政治实行西方模式的呼声始终未断。

中国必须进行政治改革。但问题在于中国的政治改革道路如何走？是渐进式改革还是激进改革？中国的政治改革以什么为指导原则？是全盘西化还是走中国式的民主发展道路？

中国式的民主首先要清除长期影响中国历史并至今还有残余的封建专制、个人专断、衙门作风、小农意识、官僚主义、以权谋私和权力腐败现象，但中国式的民主之路是一条渐进之路。中国只能通过一条渐进式的道路实行与西方不同的民主。中国式的民主拒绝外来压力，主张让中国社会渐渐地成熟和发展，使民主成为一种在中国社会中扎根的因素。中国的民主拒绝西方式的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民主，实行以东方文化为背景的重社会、重国家和集体利益的民主。这种观点已经得到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认同，并正在成为中国 21 世纪初中国知识界的主流。

中国可以借鉴但不能完全按西方民主的模式来进行政治改革。第一，因为西方的民主有西方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如西方基督教的背景等，中国的历史文化与之不同，不能照搬，如果照样画葫芦，只学西方的一些民主选举等形式，没有西方的人文背景和经济基础，没有公民社会和自由精神，只能徒有民主的形式和空壳，不但不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反而会产生新的问题；第二，西方的民主发展也有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背景和基础，西方的民主也有自己的发展阶段，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远远没有达到这样的条件；第三，俄罗斯的民主进程表明，片面模仿西方的民主发展模式会使社会付出太沉重的代价而违背民主的最基本的含义：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目标，但也是为了让老百姓生活得更好的一种工具和手段；第四，世界上许多国家实行西方式民主，但真正成功的国家不多。根据亨廷顿的研究，世界上已经经历了三波民主浪潮，第一次是 1826—1926 年，一百年间有欧洲的许多国家实行民主制；第二次民主化浪潮发生在 1943—1962 年间，近 20 年中有西德、意大利、日本、印度和以色列等实行民主制；1974 年开始至 1995 年间，又有持续 20 年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使世界上实行自由民主的国家达到了 78 个，占 164 个国家中的 47.6%，部分民主的国家达 43 个，占 26.2%，传统政体和非西方的政体的国家 43 个，占 26%。^② 但在 121 个民主和半民主的国家中，真正做得好的，除了 20 几个西方国家外，也没有几个。与中国情况最相近的印度在 1947 年就按照英国的制度实行民主选举，但现在印度除了教育、科技等发展比中国靠前外，总体发展不如中国。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因为实行西方式的民主而发展得更好。第五，西方的民主本身也有许多问题，西方的民主选举即选举出了象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这样的大独裁者，也选举出了众多平庸的领导人，同时也未能完全解决腐败、犯罪等问题。

所以，中国的民主只能是中国式的民主，其主要特征就体现为实质民主、制度民主和贤人政治的结合。

(1) 中国式的民主是实质民主。在实质民主中，民主既是社会的一个终极目标，是人本性的要求，同时又是实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一个重要工具和手段。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国家综合国力、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为目标，它是符合大多数人民的愿望和要求的，是社会主义实质民主的一种体现。改革开放使十三亿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中国的综合国力有了很大提高，生产力也有很大

^① 喻希来：《新兴世界大国的成长之旅：光荣与梦想》。

^② 转引自郑永年：《世界体系、中美关系和中国的战略考量》，《战略与管理》2001 年 5 期。

发展，这不仅是一种经济成就，而且也是实质民主的一大成就。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

但即使是在实质民主方面，中国也仍有许多工作未做好：城市中有几千万人失业或下岗，有2—3亿剩余的农村劳动力没有就业机会，还有6000万人仍处于贫困阶段，有几千万人没有学上，有几亿人身受没有社会医疗、福利、住房、退休保障或保障标准太低之苦。所有这些都涉及中国绝大多数民众的根本的切身利益。因此，中国的民主的发展应当始终以是否有利于解决这些问题做为基本的标准。解决所有这些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也是实质民主的一大进步。

(2) 要借鉴西方国家的制度民主的长处，把实质民主与制度民主结合起来。

即使在实质民主的实现方面，中国也要学西方。因为在许许多多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实质民主在许多方面比中国做得更好。但中国更需要学习西方的制度民主的长处。虽然中国的实质民主也有一套制度体系，但缺少制度民主中的形式民主、程序民主，尤其缺少对权力的有效的和实质的监督。实质民主在解决国计民生的根本问题上有其长处，但实质民主做得再好，也不能取代制度民主。正如一个好的产品需要好的商品包装一样。内容与形式都是很重要的。实质民主在对付官僚主义、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等方面的问题上表现得软弱无力。因此，形式和程序看起来只是表面的东西，但没有制度民主，实质民主容易出现变质，不能解决实质民主的活力与动力问题。苏联晚期的实质民主实际上已经被官僚主义、贪污腐败、教条主义与僵化等弊端所困扰，变成了实质上不民主。

中国特色的民主必须找到一种机制，将实质民主与制度民主结合起来。现在中国越来越严重的贪污腐败就是缺乏形式民主和程序民主的一种结果。它已经严重危及实质民主。贪污腐败现象使国家蒙受重大损失，几百亿甚至上千亿的巨额财富流失和损失，削弱了国家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经济能力，直接影响到广大人民的生活，更不用说它所造成的政治损失。中国不能只讲“形式上的民主”，也不能不讲民主的形式。

中国已经提出法治国家的口号。这是中国走向制度民主的重要一步。没有民主就没有法治，这是西方的道路，在中国就有可能变成没有法治就没有民主。当然，法治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高级法治，涉及基本政治制度和基本的权力结构；另一部分是低级法治，主要涉及培育民众尤其是官员依法办事的习惯和观念。中国几千年习惯的是法制的法，而以法治国中的法治，则主要是指如何以法律来制约管理者和权力者，两者有不同的内容。前者强调社会秩序和稳定，是治人，后者强调反对权力腐败和权力受社会监督与制约，是治权。两者如何结合也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而且中国以法治国和以法制国两方面都有很多的问题。

(3) 要把实质民主、制度民主与“贤人政治”的优点相结合。

贤人政治当然有其时代和历史的局限性，包括了大量封建的因素，这是必须抛弃的。但此乃其一，贤人政治也有其超越时代和阶级的价值内容。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同时也是那些站在时代前列带领和领导民众顺应历史潮流的杰出人才谱写的。

这一特性在中国表现尤其突出。中国几千年历史得以保持其连续性和稳定性，其中贤人政治起着重大作用。正如有学者所说，中国可以没有万里长城，中国仍然可以是中国，而如果中国没有了孔子、孟子、老子、荀子、韩非子等一批睿智的贤者，没有汉武帝、唐太宗、明太祖、康熙大帝等一大批有所作为的贤明的政治家，中国就不成其为中国。

要弥补实质民主和制度民主的这些缺陷，还需要考虑中国传统思想中富有理性的因素，进行创造性的补充和发展。贤人政治中的精华在内容上与实质民主有相通之处，一部分内容优于制度民主。当然我们不可能用“贤人政治”来取代实质民主和制度民主，但却可能用贤人政治的优点来弥补实质民主和制度民主政治的不足。以德治国就包括了部分贤人政治的内容。

因此，实质民主、制度民主、贤人政治的结合，这可能就是中国式民主的主要特点。

当然，就现阶段的中国而言，可能需要更侧重于制度民主的发展。党的十六大指出，在中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前者指实质民

主，后者指制度民主，而十六大强调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原则时，更把依法治国放在突出的位置上，“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必须严格依法办事，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①，胡锦涛主席在人大的讲话中也突出了要接受监督的思想。因此，可以说，在今后相当长一个阶段，制度民主的建设和发展是中国发展的重点和关键。

中国成长为世界大国的进程，也是中国民主发展的进程。中国式的实质民主、制度民主和贤人政治结合，将包含西方的经验但又超越西方，创建一种新的民主模式^②，将成为中国世界影响力的一个主要方面。正如一位学者所说：“一种非西方式的中国民主政治可望成为发挥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政治秩序基础。”^③甚至在《大棋局》一书中认为中国只能做地区性大国的布热津斯基近来也改变其观点说，如果中国实现其民主化进程，那么中国发挥的作用就不仅仅是地区性大国的作用，而是决定世界进程的欧美中三角中的一极：未来20年内，世界发展的方向将由美国、欧洲和中国三个主要因素决定。“如果美国搞单边主义，又拿不出采取军事行动的可信理由，世界肯定将陷入一个越来越大的冲突、先发制人行动和大劫难的漩涡。眼下美国的力量还能控制住全球局势。但从长远看，美国不可能永远单打独斗，它并非万能。它也需要伙伴。”“只有当美国负责任地发挥其领导作用，其大国地位获得世界公认时，当欧洲在消除全球政治与社会不稳定的行动中成为美国的一个重要的政治伙伴时，当中国成为一个世界体系中越来越发挥建设性作用和越来越民主的国家时，这个世界也许可能在今后20年内成为一个乐园”。^④

四、中国对美战略的选择是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的关键问题

1. 中美关系在中国成为世界大国进程中的重要性

多数人都会同意美国是中国成长为世界大国进程中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的观点。冷战后的美国成了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中国成了现存的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最快的市场经济国家，中美关系也成了中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最重要的关系，中美关系也正在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更重要的是，从大国成长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正在成长中的世界大国与既有的独一无二的世界超级大国的关系。

对中国而言，中美关系所具有的战略意义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发展自己，只要维护住中美两国之间的正常关系，对中国而言和平与发展的大局就有基本保障；只要中美不打仗，和平与发展的基本格局就不会有大的改变，中国就能持续进行国内的经济建设和政治发展；另外，美国是现在唯一与中国具有战略性矛盾的国家，也是唯一有能力对中国发动大规模战争因而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国家，再加上美国国内也有一部分顽固反华并且对美国对外政策具有较强影响力量的人，因此美国也是唯一一个既有意愿也有能力遏制中国成长的国家；美国对华战略与中国对美战略如何制定，将决定中国以什么方式、在多长时间、能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成为世界大国。

第二，中美关系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中国是个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国家，但美国在中国的对外开放中具有特殊的意义。中国所需要的外部市场、资金、技术、管理人才、信息来源、管理经验，就是说，许多事关提高中国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有相当大一部分来自美国这个当代科技发展最活

^①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第31—32页。

^② 郑永年：《世界体系、中美关系和中国的战略考量》。

^③ 布热津斯基：《秩序还是无政府状态？》，（德国）《商报》2003年3月2日。

跃、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或者要受其影响。

第三，美国是唯一深深地卷入了中国台湾问题的世界大国，中美两国关系如何直接影响中国维护国家统一和国家安全的重大利益，也将决定中国用什么方式维护统一和国家安全。

正因为如此，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都把建立、维护、发展中美正常关系放在中国外交的第一位，作为带有全局性的战略问题来处理。但如何处理中美关系，却需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2. 中美两国必然发生战略冲突的五种观点

(1) 现实主义论与帝国主义论的观点：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占主流地位的现实主义观点认为，每个国家都在最大限度地追逐国家利益，而国家利益是由一个国家的实力来界定的，国家利益越大，所需要的权力也越大，而现代国际关系的本质是权力国家之间的利益不可调和性，由不可调和到冲突甚至战争，这就是现代国际关系形成以来的规律性的现象。而这种冲突最容易发生在两个势均力敌的大国之间。中美关系的实质是新兴成长中的大国与现有的霸权国家之间的关系。由于美国的霸权性质和国际体系的权力不可调和性，美国不可能允许中国成长为世界大国。因此，中国的成长与美国的遏制必然导致严重的冲突。

另外，传统的列宁主义中关于帝国主义的观点现在也成为中美两国必然发生冲突论的理论支撑。美国是一个霸权国家，也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它代表着帝国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顶峰。而帝国主义的本质就是侵略和战争，就是掠夺和控制，就是维护本国垄断资产阶级和少数统治者利益的战争机器。

(2) 意识形态与理想自由主义的观点：一个社会主义的世界大国与一个资本主义的世界大国之间必须会发生冲突。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两种水火不相容的世界体系。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在政治上强调共产党领导，在经济上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和基础，在人权观念上强调国家和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这与资本主义的民主和三权分立、私有制、个人自由的价值观念是相互对立的，不可调和的，这一矛盾迟早会导致中美的战略冲突，中美必然互为敌人。美国国内的政治因素更会强化上述概念的现实性。越来越多的普通美国人认为，中国正在变成美国的主要对手或者潜在的敌人。只要中国的共产主义存在一天，美国就不会停止认为中国是其潜在的敌人。考虑到中国的成长，中美之间的冲突似乎更具有了现实性。美国可以容忍中国的经济发展，但不想看到中国发展对其产生的挑战。^①

(3) 文明冲突的观点：一个东方的儒教大国与一个基督教文明的大国之间必然发生冲突。中国与美国分别属于不同的文明体系。中国是东方文明的代表之一，以儒家传统和佛教文明为基础，中国的崛起将是核心国家大规模文明战争的潜在根源；中国正在与同样反西方的伊斯兰教国家之间结成反对美国的联盟，如果美国对中国作为亚洲霸权力量的崛起进行挑战，就可能发生一场大战。^②

(4) 地缘军事战略冲突的观点：美国称霸世界的战略目标决定了中美两国必然发生战略冲突。美国现在的战略完全是控制世界的霸权战略，其战略重心在于控制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控制在欧亚大陆具有战略意义的交通要道和资源中心。尤其是冷战后，美国加紧了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军事控制和军事战略布署：美国在日本、韩国和西太平洋驻有 10 多万美军，美国扩展了美日安保条约的内容，美国恢复了在菲律宾和新加坡等地的军事存在，加强了美澳新条约，“9·11”事件后，美国借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对阿富汗发动了战争，并在阿驻军和扶持亲美政权；美国的军事力量在阿富汗战争中第一次渗入了中亚地区，旨在控制这一仅次于中东地区的石油战略资源，从西北方向牵制中国；美国加紧对台军售，把大量美国军事装备卖给台湾，与台湾建立实质性的军事同盟关系；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也是旨在控制中东地区这一世界最重要的石油资源。因此，美国已经形成了对中国的战略包围态势。美国的这种战略与中国谋求发展的战略形成了矛盾，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战争冲突。

^① 郑永年：《世界体系、中美关系和中国的战略考量》。

^②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 230、266—267 页。

还有的认为，“分裂中国将是美国的战略目标，一旦条件成熟，以某种形式有限地（一个过于分裂的中国对他们也不利）肢解中国将是美国及其盟国不会放弃的选择……美国从自己的建国经验中得出，国家强大的首要基础是拥有广大的版图，而阻止一国崛起的最彻底的办法，就是肢解它的版图，让它在分裂中内耗，在内耗中为大国所操纵。在安排好欧洲地缘政治版图之后，美国及其盟国就可能如法炮制，把目标指向崛起的中国，使中国在（有限的）分裂中彻底失去世界级大国的机会”。美国的战略目标看来是：先解决欧洲即俄罗斯和东欧的问题，然后是中东，再下来说该轮到中国了，最后则是印度。^①

(5) 大国冲突是历史的发展规律的观点：从世界大国的成长和兴衰的历史来看，一个新兴的大国与一个现有的霸权主义国家必然会发生冲突。罗伯特·吉尔平在1981年写的《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一书中说：“历来解决国际体系结构与国际实力分布之间失衡的首要方式就是战争，或者具体的说，是霸权战争。”^② 世界历史上新兴国家的成长与现有的霸权国家之间的关系，通常是充满冲突和战争的历史。中国的成长也逃不脱大国关系历史的规律。美国学者米尔斯海默在其《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认为，国际政治就是大国政治，大国的生存意志是追求自身权力的最大化，即地区霸权，由于中国的飞速发展，中国会提出亚洲的门罗主义，把美国势力赶出亚洲，因而大国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③

3. 换个角度看问题：中美大冲突有可能但不是必然的

如果按照中美必然冲突的逻辑，那么实际上中国已经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要么中国放弃成为世界大国的努力，服从于美国的霸权，只成为一个经济发展的国家；要么中国继续坚持世界大国的战略目标，这就必然与美国发生严重冲突。

作者认为，中美之间存在种种矛盾，是客观的，但矛盾不等于对抗和冲突，只有矛盾发展和升级，才会发生冲突，因此，矛盾只是发生冲突的一种可能性，而没有必然性。并不是所有矛盾都以冲突的方式来解决。即使是对抗性的矛盾也是可以在不同条件下发生转化的。建国初期，中美矛盾是对抗性的，你死我活的，也发生过冲突和战争。但中美对抗性的矛盾并不是通过大规模冲突和战争来解决的，这一矛盾在苏联威胁这种共识的条件下发生了转化，同一个中国和同一个美国，却变成了反对苏联霸权的实质性盟友。同样，中苏关系也有过对抗性矛盾，中国曾把苏联视为中国最危险的敌人，也发生过冲突和小规模的战争，但后来在睦邻共处的共识下也发生了转化，20世纪80年代末期两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20世纪90年代中国与俄罗斯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从敌人变成了好邻居。仅仅这两个例子就能够说明，中美冲突是可能的但不是必然的。中美冲突必然论存在五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冲突论过多的强调中美两国的矛盾，而没有看到两国存在的共同利益，虽然两国的矛盾可能发展超过共同利益，但两国的共同利益也有可能发展起来超过两国的利益矛盾。中美两国在反对国际恐怖主义方面的新的合作表明，两国还有扩大共同利益的空间。

第二，认识问题有片面性，没有看到中美关系有发展和变化的可能性，或者只看到了变坏的可能性，而没有看到变好的可能性。比如，一些作者认为中美必然冲突所依据的显然是小布什上台前和上台初期的言论，但对照一下就可以发现，小布什对中美关系的言论已经有了重大变化，过去他把中美视为战略竞争对手，但现在他既谈中美的竞争性关系，也提到了中美之间的合作可能，而且自小布什上台后，中美关系总的来说是改善了而不是恶化了。“9·11”事件也改变和缓和了所谓中国是美国的敌人的观点。

第三，中美两国社会制度的不同并不能被认为是中美必然对抗的基本因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以苏联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它对内主张利用和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对外主张和

① 张文木：《科索沃战争与中国新世纪安全战略》，《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3期

② 转引自张睿社：《中国应选择什么样的外交哲学？》，《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1期。

③ 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参见王义桅、唐小松：《国际政治就是大国政治》，《环球时报》，2003年3月14日。

平政策和开放政策。因此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美国的资本主义的关系，已经不是传统意义的所谓你死我活的关系，不是谁战胜谁的关系，也不是零和关系。甚至美国国务卿鲍威尔也说，“中国不再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动荡中，它不再输出共产主义。它不再是资本主义的敌人。”^①

第四，中美分别属于不同的文明体系，但世界上总是存在不同的文明的。如果说世界上只有一种文明才会避免战争，那可能世界永远不会有这一天。人类必须学会在多种文明生存和发展的条件下和平共处。在人类发展到 21 世纪的今天，许多文明之间固然存在着不同的冲突，但也有相互融合的一面。中国文明曾经包容了佛教，后来又包容了来自西方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现在也可以包容西方的资本主义文明。只要美国人学会宽容与包容，不同文明的中国与美国之间未必能发生战争。从现实来看，冷战后虽然也有波黑不同的宗教民族之间的冲突，但不也有东盟不同的文明宗教国家之间相互合作的潮流吗？多元化的世界必须是多种文明的共存。因此，不同文明的国家可能会有冲突，但也可能会合作和共处。

第五，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新兴大国的成长与现有的霸权国家之间，在历史上的确曾经发生过多次重大的冲突和战争，“历来的新兴大国必然是对现存大国的潜在战略威胁，其经济发展不免受到后者的遏制”^②，但实际上也并不完全如此。

美国 19 世纪的成长基本上没有受到欧洲大国的干扰和压制。英国与美国的关系在 18 世纪美国独立和独立后初期曾经有过矛盾，甚至 1812—1814 年间发生过美英战争，但这个矛盾不是新兴大国与既有大国的矛盾。在 19 世纪 60—80 年代这一美国成为世界大国的关键时期，美国没有受到英国太大的干扰和压制，反而可以说美国的成长得到了英国的庇护。英国可能倾向于认同这个与自己长得相似的国家为霸权国家的“接班人”。

从方法论来说，从历史角度论证中美必然冲突的观点是一种宿命论和历史循环论。如米尔斯海默在其《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就认为，旧制度、旧时代的逻辑依旧，国际政治仍然是大国政治，并且依然处于悲剧式的历史循环中，在他看来，所有的大国都必然会谋求地区霸权，因而中美冲突是难免的。这种观点看不到历史的变化和人类的进步，也看不到全球化时代国际政治的变化，他只强调所谓进攻性的现实主义的逻辑，却忽视了社会制度、历史文化、领导人意志在决定国家外交政策中的作用，把国家完全等同于一个没有人性、没有理性、永不进化的利维坦式的怪物。^③

可见，中美关系存在着较大的空间，它有两种可能性而不是只有一种可能性：即中美产生矛盾和磨擦甚至局部冲突是难免的，它可能导致严重冲突，但也有可能避免导致严重冲突。

4. 中美关系的走向取决于中美双方如何处理与对方的关系

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和成长中的大国，与美国的关系形成了复杂的局面。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将不同于历史上有过的那种关系，它既不是中国向美国提出全面挑战，也不是美国支持、更谈不上庇护中国的关系。中美关系是一种全新的大国关系。中美关系是敌是友，非敌非友，敌友参半，尚未定型，如何走向取决于双方如何建构与对方的关系。

中国要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但中国无意全面向美国进行挑战，中国在历史上从来不是一个在全世界有影响的全球性的超级大国，从来对东亚以外的世界事务没有太多的兴趣，是个保守的防御型的东亚大国。中国反对美国的强权政治，但中国从来都承认美国作为一个重要的国家在国际体系中占有特殊的作用和地位。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不是冷战时期的美国与苏联的关系。因为中国没有象苏联那样的超级的可以与美国相对抗的军事实力，也没有称霸世界的野心，中国不具有扩张性。^④

① 鲍威尔：《在亚洲协会年度午餐会上的讲话》，2002 年 6 月 10 日，美国驻华使馆新闻文化处提供。

② 张睿壮：《重估中国外交所处之国际环境》，《战略与管理》2001 年第 2 期。

③ 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④ 张毅君：《中美不会重蹈苏美冷战》，《环球时报》2002 年 6 月 20 日。

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坚持建立和形成新的国际经济和政治新秩序，对现有的体现西方过去利用历史优势形成的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秩序和规则进行改造，或者用西方的观念来说就是对现有的国际秩序进行“修正”。这也与美国形成了有合作也有挑战的关系：中国融入世界体系，但中国也要坚持自己的基本制度。总之，成长为世界大国的中国与现有的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的美国的关系，即有挑战，也有合作，既有融入体系的一面，也有改造和修正体系的一面。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中国成长过程中对美国的政策：有限的挑战（而不是象苏联那样全面挑战）和有限的合作（融入但不是完全成为西方体系的一员）。中国对美政策到底是挑战多还是合作多，具有很大的可塑性。

从美国方面来说，美国国内在对华关系上形成两种对立的观点。一部分人主张，中国的成长是对美国的挑战，中国成长的目的就是要取代美国，全面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中国因此构成了对美国的威胁，美国应当趁中国羽毛未丰，压制中国的成长，将中国的发展限制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另一部分人认为，中国的发展方向不明，因此应当争取把中国拉入到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体系中来，通过融入政策将中国改造成为一个西方式的国家，同时，在国际体系中给中国更高的地位，承认中国的大国地位和作用。

在美国对华政策中起着主导作用的美国政府，在正式场合下也多次声明：美国欢迎一个开放的繁荣和强大的中国，欢迎一个在世界体系中发挥积极作用和负责任的中国。美国总统布什 2002 年 2 月 21 日来华进行访问时指出，“美国欢迎一个稳定、繁荣、与邻国和平相处的中国，我们将和中国一起去完成成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建立一个繁荣和稳定的亚洲的伟大任务”，中国不仅是一个贸易伙伴，而且也是一个伟大的国家，“美中关系是成熟的、彼此尊重的，对美中两国和全世界都很重要。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员，是全球贸易体系的伙伴，拥有参与制定和执行贸易规则的权利和责任。过去 30 年，我们看到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相信在未来同样的变化会继续发生。这些变化不仅给中国带来深远的影响，而且对世界各国也具有积极的意义。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是稳固的，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具有巨大的潜力。与中国在贸易、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反恐等等重大问题上进行合作是符合美国自身利益的。”^① 美国国务卿鲍威尔甚至希望中国“做出与全球领袖地位相称的决定和行动”^②。2002 年美国的国家安全报告虽然批评中国还没有做出“有关国家性质的根本选择”（这主要是指中国未选择西方模式），批评中国采取过时的方针，追求可威胁到亚太地区的邻国的先进军事能力，中国与美国在台湾问题、人权问题和不扩散问题上有分歧，但也没有把中国作为主要对手。美国期待中国的转变，同时，美国也力图与变化中的中国建立建设性的关系，在彼此利益相互重合的方面已经进行了良好的合作。也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美国对待正在成长中的中国的政策：有限遏制（不是象对苏联那样全面遏制中国）和有限接触与合作（支持中国融入世界体系但对中国抱有警惕）。到底是遏制为主还是以接触与合作为主，也有一个较大的空间，也取决于双方如何互动。

美国将根据中国的意图来制订对华战略，如果中国与美国敌对，那么美国就会采取把中国作为敌人进行遏制的对策；而如果中国对美国采取建立正常关系的立场，那么美国有可能倾向于采取接触和融入的对策；反过来也是一样：中国将根据美国的对华战略来制定对美战略，如果美国把中国当作敌人来遏制，那么中国只能把美国作为中国的首要威胁；而如果美国对中国采取和平的、接触性的、建设性的政策，那么中国也会采取同样的政策。双方的立场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每一步都可能影响到中美关系的重大变化。

5. 中国要从改善中美关系的战略高度处理对美关系

如何避免与美国发生大规模的冲突，是中国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和成为世界大国历史进程中的重大的战略问题。

只要中国坚持下面五个原则，处理中美关系就可以比较顺利，就可以防止中美之间的直接的军事对抗

^① 布什：《与中国保持密切对话符合美国利益》，《人民日报》2002 年 2 月 22 日。

^② 鲍威尔：《在亚洲协会年度午餐会上的讲话》。

和战争，中国成长为世界大国就有了基本的国际环境的基础，美国即使不欢迎中国成长为世界大国也无可奈何：

(1) 中国只是争取与中国的人口、面积、历史、经济发展水平相应的世界大国，既无意把美国赶出亚洲（美国在韩国日本驻军虽然有针对中国之意，但那主要是韩国和日本与美国之间的事情），更无意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中国永远不做那种在全世界到处称霸的超级大国；

(2) 坚持改革开放的发展道路，在融入世界体系过程中，既遵守世界体系的规则，又要坚持中国的合理合法的利益；

(3) 最重要的是发展经济，提高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综合国力，而不是优先发展军事力量，更不能与美国进行军事竞争，“9·11”事件表明，最强大的不一定是安全的；

(4) 中国只要保持较高的经济有效增长，台湾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是有保障的，中国也就可以不至于因为台湾问题而与美国发生军事冲突；

(5) 用和平方式解决与邻国的纠纷，与中国的周边国家保持和发展睦邻友好关系；

中国的最大威胁并不来自于美国，而是来自于中国内部问题。

一个国家的威胁通常包括内部和外部威胁。我们必须对美国对华战略和政策的变化保持高度的警惕和准备，但也没有必要夸大美国对中国的这种威胁。美国虽然对中国成长构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但美国总体而言不可能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人侵，历史上看，美国也对中国的领土没有野心，美国是中国的问题但不是中国的威胁。这是美国与历史上对中国形成重大威胁的沙俄、日本的不同，也是与强迫中国割让领土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的英国的不同。

对大国来说，内部威胁可能始终是第一位的。中国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美国对中国的遏制，而是来自中国内部问题的积累。中国虽然经历了 20 多年的快速增长和发展，但这种发展是不平衡的，是脆弱的，是不稳定的：如果严重的腐败问题、众多下岗工人和大量剩余的农村人口的就业问题、越来越大的贫富悬殊问题、社会治安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等得不到解决或处理不当，就可能引发国内政治局势的动荡，从而中断中华民族复兴和成长为世界大国的历史进程。

因此，中华民族能否实现伟大的复兴，中国能否在本世纪成为世界大国，最主要最严重的挑战不在外，而在内。

（责任编辑：于铁军）

《东亚：变幻中的政治风云》一书出版

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锡镇主编的《东亚：变幻中的政治风云》一书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于 2002 年 10 月正式出版。本书以生动活泼的纪实手法展现了自 1997 年东亚金融危机以来东亚各国政治发展的跌宕起伏，同时，也勾勒了“9·11”恐怖事件对东亚各国政局的冲击和引发的新的变数，而且还透视了各国在政治经济改革道路上的初步实践。本书涉及东亚除中国以外的 11 个主要国家和东盟地区组织。作者在阐述各国政治发展脉络时尽可能突出发展阶段、重大事件和演变特点。本书是研究当代东亚政治颇具参考价值的读物。

（院 刊）